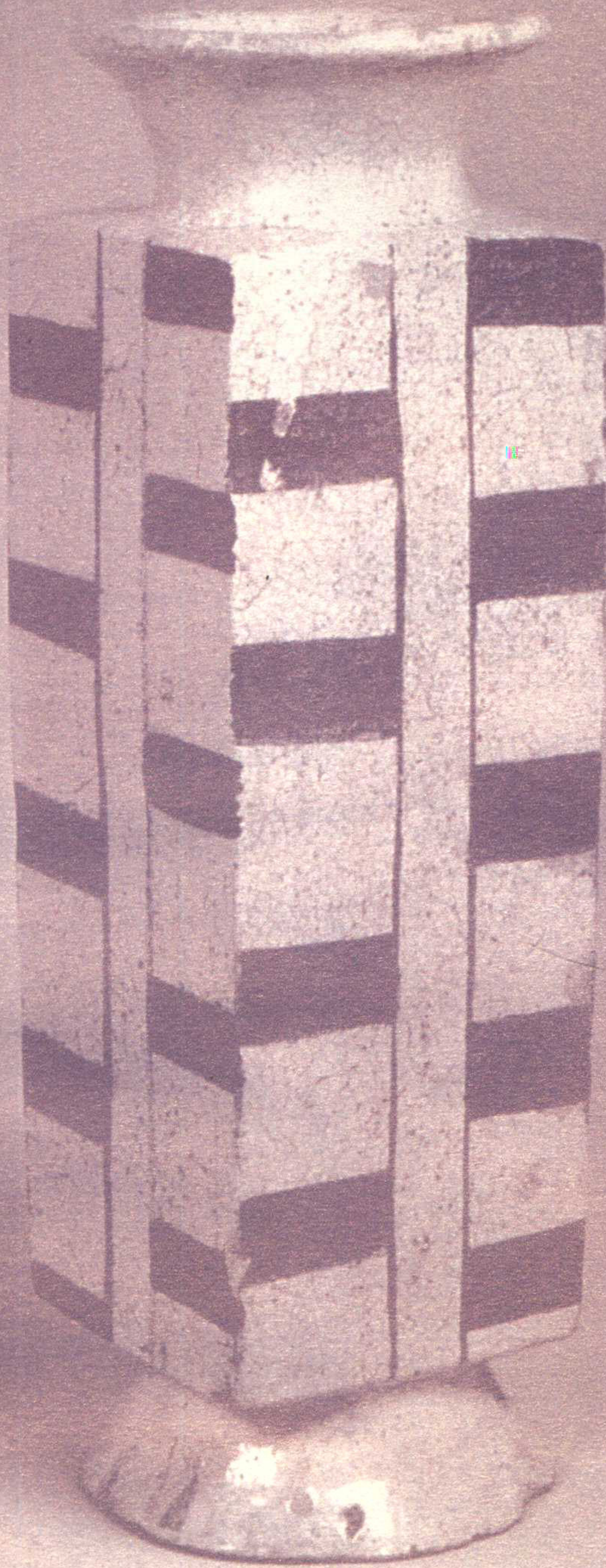


谢明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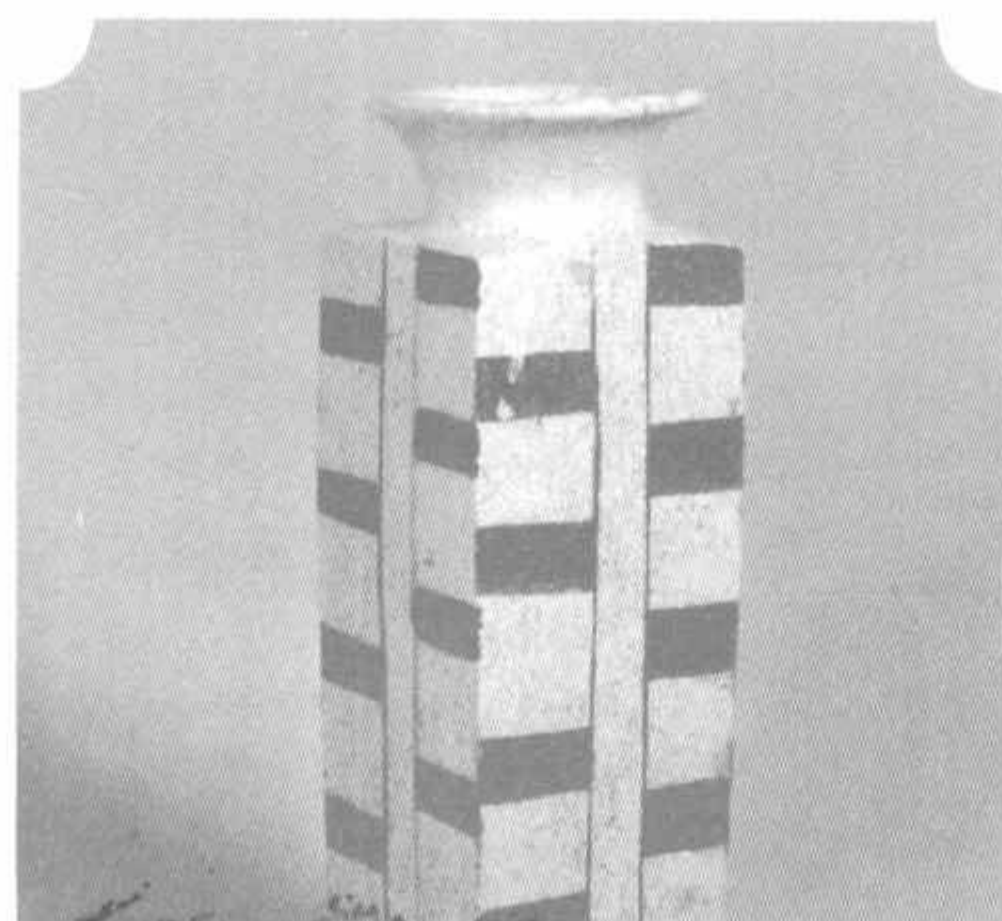
中国陶瓷史论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国陶瓷史论集

谢明良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 © 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陶瓷史论集 / 谢明良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
ISBN 978-7-108-05667-2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陶瓷—工艺美术史—中国—文集
IV. ① J5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4033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张国荣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588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 数 309 千字 图 381 幅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一 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	1
墓葬出土陶瓷概观	1
墓俑出土情况	4
山西唐墓出土的唐三彩	11
二 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	33
窖藏设施和出土器类	34
窖藏器物的种类和组合情况	36
四川器物窖藏性质的厘测	38
对宋元时期窖藏的省思	43
三 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	
——从所谓“柴窑”谈起	58
柴窑传说的变迁	58
柴窑作品的比定	60
耀州窑窑址出土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	62
洛阳后周墓出土耀州窑青瓷的启示	67
四 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含义的几个问题	81
官款白瓷的时代	83
出土文物所见的“官”款	85
“官”款含义初步探讨	87
五 琮瓶的变迁	126
宋代的“琮”和“琮瓶”	127
宋代琮瓶的种类和外观特征	129

琮瓶的形态变迁	131
宋代琮瓶原初功能的省思	136
琮瓶的末裔	141
六 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	
——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	162
汪氏墓群出土的仿古陶器	163
洛阳王述墓和赛因赤答忽墓出土陶器	168
从区域的角度看北京和内蒙古地区元墓陶瓷	172
附论：记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	188
七 对于史天泽墓的一点意见	
——兼评《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	208
对史氏第二号、五号、六号、七号墓年代厘定的省思	209
有关史氏第三号、八号墓的年代问题	211
关于史天泽墓的疑点——对史氏家族一号墓年代的一点意见	214
有关墓主比定的问题点	222
八 十五世纪的中国陶瓷及其有关问题	232
明代御厂的设立和十五世纪景德镇官窑的问题点	232
十五世纪官窑瓷器的款识问题	236
有关墓葬出土陶瓷的几个问题	239
对于近年来十五世纪官窑瓷器编年研究的省思	243
九 乾隆的陶瓷鉴赏观	257
古陶瓷鉴识能力的养成	258
对宋瓷的鉴赏风情	265
髹墨辟暴观及其对古瓷的修补方案	269
从戒“玩物丧志”到“河滨遗范”	275
后 记	292

一 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在唐代政治、军事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李渊父子即以太原为根据地，起兵攻取长安，建立唐朝进而统一中国。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定太原府为北都，玄宗开元年间又将河中府（蒲州）升格为中都，天宝元年（742）改北都为北京，显示李唐王室对于河东道的重视。然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比起陕西、河南等邻近省份，山西唐墓发掘的数量不多，各墓出土的陶瓷数量亦较少。尽管如此，目前的资料已基本反映该省唐墓陶瓷的一般状况。就是因为出土陶瓷有限，反而有利于观察墓葬陶瓷的最低所需，从而可为今后研判包括山西地区在内的北方唐墓陪葬陶瓷之基本种类提供线索。其次，相对于陕西等地，山西唐墓陶瓷种类显然也有所偏重，说明了各地区可能存在的不同葬俗。由于山西唐墓出土陶瓷至今未有专文探讨，因此本文拟从整理该省唐墓陶瓷出土情况着手，进而谈谈与之有关的几个问题。山西唐墓出土陶瓷资料及文献出处均列记于文后附表，以下论述除非必要，不再重复注明。

墓葬出土陶瓷概观

截至目前，经正式发表且出土有陶瓷的山西唐墓计三十余座，分布于大同、侯马、长治和太原等地区（附表参照），而以长治和太原较为集中。大同地区唐墓仅三座，出土陶瓷数量极少，如阳和砖瓦厂四号墓只见陶罐一件，同砖瓦厂五号墓只出土镂空彩绘陶盆、罐盖和若干残盆罐。不过另一座周家店砖瓦厂七号墓则出土两件白瓷碗，另有长颈壶、彩绘带座罐各一件。后者带座罐系由座、盆、罐、盖组成，盆底亦镂空，从而可推测前述阳和砖瓦厂五号墓的镂空盆及罐盖，可能即所谓带座罐的部分构件。侯马地区唐墓计二座，均位于南西庄、东庄和秦

庄之间，其中三号墓只出一件带系陶罐，二号墓除有陶盆一件外，另出土六件青瓷罐，可惜报告书中未载图版，具体造型不得而知。尽管报告书中并未记明上述墓葬是否曾遭盗掘或扰乱，若就现存遗物而言，正式公布的大同、侯马地区唐墓陶瓷种类贫乏，数量极少，目前少见流行于华北广大地区唐墓的陶明器模型和俑类。墓葬构筑亦较简陋，侯马第二、三号墓均属平面呈刀形的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大同地区的三座墓亦为土洞墓，不过周家店砖瓦厂七号墓除设有阶梯式墓道，于圆形洞室左侧另辟二室套在正室东北。

太原唐墓分布于石头庄、北堰村、晋祠和金胜村，¹而以金胜村最为集中；经报道出土有陶瓷的七座金胜村唐墓均属带壁画的非纪年墓。相对的，已公布的十余座长治地区唐墓皆无壁画，但多属纪年墓。纪年时代早自显庆五年（660）范澄夫妇墓，晚迄大中三年（849）郭密墓。上述二地区唐墓中虽有个别墓葬为土坑墓，或有于墓室另辟耳室的情形，但绝大多数墓葬均属带甬道墓门的单室砖墓，甬道墓门券顶，墓室穹隆顶，室四壁一般略外弧，与目前所见大同、侯马唐墓构筑有所不同。

虽然各墓保存情况不一，有些曾遭盗掘或扰乱，不过若就现存发掘出土的陶瓷而言，太原、长治两地区唐墓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出土陶瓷可大致区分为器皿类、俑类和明器模型三大类。器皿类中除了若干具体造型不明的壶罐之外，出土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短颈或无颈鼓肩大罐、钵、双系罐、碗、豆形器、长颈瓶、盘、碟、盆、注壶、小罐；个别墓葬则出土了奩和大口敞沿钵形罐。上述作品多为无釉陶器，但包括若干青瓷、青釉、白瓷、三彩等。黑褐釉作品目前只见于金胜村三号墓的碗和碟。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墓葬皆出土了数量不等但造型雷同的广口大罐，其中景云元年（710）李度夫妇墓为带盖青瓷罐（图1），余均属无盖陶罐。后者并有于罐身施加彩绘者。这类罐是太原、长治唐墓中个别器形数量最多，出土次数也最频繁的作品，至少有十四座墓都曾出土。其中，贞元八年（792）宋嘉进墓出土十件，显庆五年（660）范澄夫妇墓（图2）、长安四年（704）王义墓、大历六年（771）王

1 此外，另有少数未经正式报道而只见于简报的墓葬，无法得知是否出土有陶瓷。如著名的太原董茹庄万岁登封元年（696）壁画墓（代尊德等：《在基本建设中太原市发现古遗址及唐宋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3期，页116-117；另《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1期，图版22；1954年12期，封底）。不过若依据研究者的间接转述，该墓似亦出土有陶瓷（解希恭等：《太原市郊古墓，古寺庙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4期，页57-58），然详情不明。

休泰墓和前述李度夫妇墓各出土了五件这类罐。此外，金胜村太原化工焦化厂墓和金胜村六号墓也分别出土了六件，后者因包括一件尺寸稍大的作品，故尺寸相近的同式罐应以五件计算。从北方唐墓出土陶瓷看来，该类罐于河北清河咸亨元年（670）孙建墓、²河南陕县开元三年（715）重修的姚懿墓等亦曾出土，³可知其并非山西唐墓特有的随葬器物。不过太原、长治一带唐墓的出土频率显然更为频仍，于数量有限的出土陶瓷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似乎还经常以五件一组的形式入圹，可说是上述两地具有地方色彩也是最基本的墓葬出土陶瓷之一。就这点而言，前述侯马地区二号墓出土的六件报告书未载图版的青瓷罐有可能亦属同类作品。

该类罐于墓室的出土位置不尽相同，不过如范澄夫妇墓、王义墓均将之置于墓室四隅，李度夫妇墓的五件青瓷盖罐则陈设于墓室所砌棺床和墓志之间呈半环形排列，河北孙建墓亦纵向排列于墓志前方，可能具有某种葬仪功能。从金胜村六号墓出土的五件尺寸一致的罐中均残留有谷物一事推测，该类罐应是为死者设食的五谷罐（瓶）。⁴以贮存谷物的陶罐陪殉入圹的习俗由来已久，明器谷物罐的造型亦颇多样，而从过去发掘甘肃陇西宋墓所出内盛糜、谷、荞麦等三种谷物的彩绘带座陶罐⁵以及大同周家店砖瓦厂七号墓带座陶罐中置有装盛食物的上下叠扣的白瓷碗推测，这类流行于北方唐墓，并曾见于前引大同阳和砖瓦厂五号墓的所谓带座罐或塔式罐，无疑也属明器谷物罐。其次，从太原唐墓石家庄一号墓出土的五件与带座罐意匠基本一致的于广口罐下置喇叭式高圈足的作品，既反映了山西地区亦通行以带座陶罐

2 辛明伟等：《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文物》1990年7期，页51。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翟继才等）：《陕县唐代姚懿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1期，页130图七之1、3。

4 墓葬出土内贮谷物的实例甚多，而所谓“五谷罐”一词可见于1960年敦煌晋墓陶罐上的“升平十三年润（闰）月甲子朔廿一壬寅张弘妻汜心容五谷瓶”墨书（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马世长等〕：《敦煌晋墓》，《考古》1974年3期，页196图13之1、2）。其次，唐代德清窑中也有自铭为“粮罍”的作品（德清县博物馆〔章清初〕：《浙江德清发现唐代黑釉粮罍》，《文物》1989年2期，页96）；从1979年征集到的一件瓶腹刻有“上虞匠人项霸造粮罍瓶一个献上新化亡灵王七郎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的北宋青瓷粮罍瓶，不难窥知该类瓶是专为死者设食的明器（报告参见沈作霖：《介绍一件宋咸平元年粮罍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页196；另图版16之6、7）。此外，也有与前述粮罍造型类似但自铭为“食瓶”的唐代越窑青瓷作品（王莲瑛：《介绍一件自铭“食瓶”的唐越窑青瓷》，《文物》1993年2期，页93）。上述南方诸例，亦可说明具有类似功能的作品，因地区的差异而存在的相异造型。

5 陈贤儒：《甘肃陇西县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9期，页90图版14。徐莘芳认为此即《大汉原陵秘葬经》所记载的“五谷仓”，并引现藏于巴黎敦煌发现的晚唐写本所记“……恐魂灵饥，即设熟食瓶、五谷袋引魂，今葬用之礼”，认为唐代有用五谷袋和熟食瓶下葬的（徐：《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2期，页94-95）。

入圹，并可由出土时排列于死者头部一事推测，其与长治李度夫妇墓陈列于棺床前方的五件青瓷盖罐，有着类似的功能。不过太原、长治一带唐墓显然更流行以五件一组的广口罐陪葬，而该一习俗晚迄同省金墓亦经常可见。⁶

墓俑出土情况

就已公布的山西唐墓资料而言，俑类和明器模型目前集中于太原、长治一带，除了金胜村五五五号墓和太原化工焦化厂墓出土有施罩三彩或单色低温铅釉作品，其余均属无釉陶器。陶俑种类包括武士、文吏、男女侍、跪伏俑、骑马、骑驼、镇墓兽以及鸡、鸭、猪、犬、牛、羊、马、驼等动物像。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镇墓兽的种类颇多，就其造型看来，计有双首蛇（龙）身俑、人面鱼身俑、独角兽、匍匐兽、兽首人身跪俑、匍匐俑、牛首人身俑和俗称的魃头等。武士（天王）俑多为两件一组，身躯高大，身着铠甲，表情狰狞，与一般的武装侍俑较易分辨（图3），至于所谓的魃头造型亦较高大且多成对出土，一人面一兽面呈蹲坐状（图4）。所谓武士（天王）和魃头常见于北方各省唐墓，不过山西唐墓该类作品于细部造型和装饰上，则与西安、洛阳地区一般所见同类俑有较大的不同，说明来自不同窑厂，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其次，从长治仪凤四年（679）乐方夫妇墓、文明元年（684）乐道仁墓、长安四年（704）王义墓、大历六年（771）王休泰墓等可确认出土位置的墓葬看来，成对出现的武士俑与魃头均排列于墓门甬道或墓室近入口处，其与其他地区同类俑出土位置一致，说明尽管细部造型有别，但各地均是以该类陶俑担任防卫恶灵侵扰墓室的任务。然而太原、长治一带唐墓，除了上述武士俑和魃头之外，另出土了造型奇特的双首蛇（龙）身（图5、6）、人面鱼身（图7）、独角兽、伏兽和兽首人身跪兽等作品。上述作品的确实名称目前已难得知，不过若依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的记载，则该类于今日被称为镇墓兽的明器，在唐代可能总称为

6 如绛县金墓（张德光：《山西绛县裴家堡古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4期，页59）、长治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墓（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故漳金代纪年墓》，《考古》1984年8期，页742图8之3）各出五件陶罐，其中绛县金墓所出者内存有谷物。此外稷山县五女坟五座金墓均于室北壁下置陶罐四至五个，内装黍子、板豆、谷子等（参见畅文斋：《山西稷山县“五女坟”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7期，页34-35）。

“抵蛊”。⁷

就山西地区出土双首蛇（龙）身俑而言，其细部造型特征不一而足，既有人首、兽首之分，也有无足和带足之别，人首者有的头戴尖帽，有的于头上置角形髻，兽首者还可区分为带角或无角者，至于躯体造型也有直条形和曲形，个别作品则有做圆拱形者。过去徐苹芳氏曾依据成书于金元时期的《秘葬经》之记载，推测双首蛇（龙）身俑或即是天子至庶人墓中所设“墓龙”；人首鱼身俑可能是传说中啼声似小儿的“鲋鱼”或《秘葬经》之“仪鱼”。⁸也有学者主张人首蛇（龙）身俑是《山海经》中的山神，人首鱼身俑为海神；⁹或以为双首蛇（龙）身俑应是《楚辞·招魂》所载“其角髻髻然”的“土伯”。¹⁰但是确切的名称及其在墓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至今不明。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掘广东海康元墓时出土有于砖上阴刻双人首蛇（龙）身和双人首蛇（龙）身交尾像等，其上还分别阴刻题记“地轴”和“勾陈”名称（图8）。¹¹王去非氏曾经依据唐代文献记载结合出土实物，主张文献所见“地轴”或为本文所称的魃头。¹²然而若就海康元墓出土的阴刻砖资料看来，笔者同意报告人所指出的，“地轴”应是双人首共一蛇（龙）身的明器。而其造型正与山西唐墓的双首蛇（龙）身俑一致。其次，依据《秘葬经》所载的方位图，则“地轴”系安放于墓室东西二侧；双首蛇（龙）身交尾的“勾陈”，可依照安徽南唐姜妹婆墓买地券所载“东止甲乙青龙，西止庚辛白虎，南止朱雀，北止玄武，内止勾陈”等券文，¹³推测

7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尸窆：“刻木为屋舍、车马、奴婢、抵蛊等，周之前用涂车、刍灵，周以来用俑。”（据方南生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23）

8 徐苹芳，同注5，页93-94。

9 见《南京博物院藏宝录》（香港：三联书店等，1992），页125-126，该节由黎忠义氏持笔。

10 朝阳市博物馆等（田立坤等）：《介绍辽宁朝阳出土的几件文物》，《北方文物》1986年2期，页31。此外，长谷部乐尔氏则提示了该类人首鱼身俑可能与十世纪模仿动物与人形的水注有关。见同氏，《十世紀の中国陶磁》，《東京国立博物館紀要》3（1967），页242。

11 曹腾骅等：《广东海康元墓出土的阴线刻砖》，《考古学集刊》2（1982），页175图5。

12 王去非：《四神、高髻、巾子》，《考古通讯》1956年5期，页50-52。

13 葛介屏：《安徽合肥发现南唐墓》，《考古通讯》1958年7期，页56-57。类似内容的券文还见于南唐升元二年颍川陈氏买地券、后蜀广政十八年宋琳买地券、金明昌二年地券和南宋宝庆二年徐德宝造墓告神文等，参见陈槃：《于历史与民俗之间看所谓“瘞钱”与“地券”：附论所谓“镇墓券”与“造墓告神文”》，《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南港：“中研院”，1981），页855-905；原田正已：《墓券文に見られる冥界の神とその祭祀》，《東方宗教》29（1967），页17-35。不过上引宋琳墓出土的双人首蛇（龙）身俑人首分别呈一男一女，并发现于墓后室西壁砖墙下，图见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任锡光）：《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考古》1958年5期，图版伍之6。

“勾陈”应是安置于室之中央方位。¹⁴

如前所述，山西唐墓双首蛇（龙）身俑造型颇为多样，不过就可确认出土位置的该类俑而言，虽有少数墓葬如长治北石槽二号墓系陈设于墓室东侧，但不少墓葬如长治地区范澄夫妇墓、乐方墓或崔孛墓，一律将之置于墓室中部紧邻墓志之北侧，即墓室之中央部位。同长治王休泰墓所出该类俑，更是置于墓室所设排列整齐的一组陶明器四合院落模型之正中央，出土位置特殊，很难说是巧合。因此，无论从陈放位置或比较时代较晚的海康元墓阴刻砖具像资料看来，若说山西唐墓的双首蛇（龙）身俑可能属于“勾陈”或“地轴”一类的镇墓陶俑，也许并非无的放矢。

古代中外各地区亦均见有类似造型的异兽，如中亚地区墓葬曾出土双兽首带翼连身异兽，然其存在时代颇早，可上溯至公元前五至前三世纪，¹⁵但目前并无确凿的资料可说明其与中国同形作品有关。另一方面，著名的《山海经》也记载了不少双首连身神兽，其中如“蛭蛭在其北，各有两首”（《海外东经》），“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海内经》）。林巳奈夫氏认为，名为蛭蛭者应如武氏后石室画像石雷公图所见的双龙首连身兽；所谓的延维亦见于沂南画像石中地下神兽，人主得而食之，可以雄霸天下，¹⁶而汉画像所见推测为蛭蛭、延维的神兽即分别与本文的双兽首、双人首蛇（龙）身俑造型有共通之处。笔者深知，欲将唐墓出土文物与古典图像或文字记载进行附会，无疑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无意在此做进一步的抽象比对。不过山西太原、长治等地出土的人首鱼身俑则可能提供若干有趣的线索。从江西新余市南宋嘉泰三年（1203）温氏九孺人地券“谁为书，水中鱼，谁为读，高山禄，安葬之后，内

14 曹腾骅等，同注11，页179参照。所谓勾陈，据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紫宫中有勾陈六星，大星（勾陈一）即现代的北极星。《晋书·天文志》说“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石氏星经》亦称“天皇大帝在钩陈中央”，钩陈即勾陈，是道教的天皇大帝（台北：明文出版社，1985，页39）；其神格化的形象见于山西永乐宫三清殿后檐墙西半部壁画（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文物》1963年8期，页23）。勾陈亦是六壬式十二神将之一，据《秘葬经》的记载，其与腾蛇、朱雀、白虎、玄武、天空合称“六神藏”是大夫以下至庶人择时下事所用（见《永乐大典》〔台北：世界书局，1962〕，第51册，卷八一九九，页5）。另外，从部分买地券券文内容可知，勾陈是职掌墓之“四域”。例子甚多，可参见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略考》，《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86（东京大学，1981），页238-240等。

15 如著名的 Issik 古墓（公元前五～前三世纪）就出土了双兽首带翼连身异兽，参见东京国立博物馆等编：《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58），图18。

16 林巳奈夫：《汉代鬼神の世界》，收入《漢代の神神》（京都：临川书店，1991），页138、211等参照。

外存亡，平皆安泰，急急太上律令”券文得知，鱼与葬仪有关。¹⁷类似的买地券文于南京中华门外板桥镇西晋永宁二年（302）墓中亦可见到，文曰：“若有问谁所书是鱼，鱼所在深水游，欲得者河伯求。”¹⁸文中所提到的河伯据《山海经·海内北经》是人面乘两龙，晚迄前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河伯人面，乘两龙，一曰冰夷，一曰冯夷，又曰人面鱼身”¹⁹。这样看来，与葬仪密切相关的鱼似乎是由呈人面鱼身造型的河伯所掌管，并且晚至唐宋时期仍存在该观念。

唐墓出土的人面鱼身俑，鱼身多刻画鱼鳞，状似鲤鱼，而被称作“至阴之物”的鲤鱼（《天中记》）不仅曾被道家仙人作为乘骑而升天（《列仙传》），唐代的人还相信它“又能神变，乃至飞越山湖”（《初学记》），具有生死两者旅行中的神使性质。²⁰或许所谓的人面鱼身俑亦具有神使之功，亦即作为河伯的象征或其斥候导引；从《淮南子·坠形篇》“后稷塋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等记载看来，其甚至还可能具有生死转合的功能。²¹如果人首鱼身俑与河伯传说的推测无误，则反映了唐墓出土镇墓异兽中包含了若干渊源颇早的作品。就此而言，经常与人首鱼身俑同墓伴随出土的推测或与所谓“勾陈”“地轴”有关的双首蛇（龙）身俑，似不能排除其也与《山海经》所载类似神兽有关的可能性。而前述后蜀宋琳墓出土的该类俑双首分别呈一男一女，其是否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造型有关？亦颇耐人寻味。

事实上，山西省之外，其他省份亦曾出土该类陶俑，有的学者因南方唐墓亦可见到这类陶俑，遂主张其为南方特有的随葬品，²²并认为除了山西太原、长治之

17 李小平：《新余市渝水区发现南宋纪年墓》，《南方文物》1993年1期，页98；此外，陈槃氏同注13，页859-860，所引马氏地券亦书“书积券是东海鲤鱼仙，读券元是天上鹤”；唐戴芳墓志亦云：“是谁书，双鲤鱼，是谁读，双白鹤，鲤鱼入深渊，白鹤飞上天。”

18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6期，页44。另外，小南一郎氏亦曾指出该券文所记鱼与购买墓地的宗教仪礼有关，见同氏：《神亭壺と東吳の文化》，《東方學報》65（京都，1993），页266、279。另外，从北宋靖康元年（1126）杜氏买地券文得知，河伯又具有购置墓地时作为见证人的身份。可参见孝感市文化馆（李端阳等）：《湖北孝感大湾吉北宋墓》，《文物》1989年5期，页70。

19 前引《酉阳杂俎》诺皋记上，页128。

20 有关于鱼的神使功能，均参见陶思炎：《中国鱼文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页106-109。

21 参见陶思炎，前引书，页109-112，同氏并认为唐宋墓出土的人首鱼身俑即是意取鱼的复苏变化之功。

22 陕西省博物馆编：《隋唐文化》（香港：学林出版社，1990），页109。

外，北方其他地区唐墓未有发现。²³就笔者所知，双首蛇（龙）身俑最早见于山东淄博临淄北齐崔博墓（推测卒于573年或稍早）（图9），该墓并伴随出土了单人首蛇身俑和呈跪拜造型的所谓匍匐俑。²⁴此后，上述双首蛇（龙）身俑等陶俑踪迹一度不明，要晚至七世纪才再度出现。山西之外的北方唐墓如辽宁朝阳唐咸亨四年（673）左才墓、²⁵朝阳市北郊狼山唐墓、²⁶河南安阳唐上元二年（675）杨侃夫妇墓（图10）、²⁷天津军粮城唐墓、²⁸献县东樊屯村唐墓、²⁹清河咸亨元年（670）孙建墓、³⁰文安县麻各庄咸亨三年（672）董满墓³¹和南和县东贾郭村墓等都曾出土。³²此外，辽宁朝阳贞观九年（635）张秀夫妇墓也出土了未揭示图版的所谓墓龙，可能亦属同类陶俑³³，后者若推测无误则是继北齐以来唐墓出土该类作品的最早纪年遗物。将上述资料结合山西唐墓所出该类作品，可以看出双首蛇（龙）身俑以双人首造型最为常见，就纪年墓而言，要晚至山西长治长安四年（704）王义墓才出现双兽首连身俑，不过从七世纪墓葬如朝阳左才墓（673）、长治王深墓（679）亦曾出土单首蛇（龙）身俑看来，单首或双首蛇（龙）身俑两种相异造型是并存于同一时代当中。这与山东淄博北齐武平四年（573）崔博墓中不仅出土了双人首蛇（龙）身俑，同时出土了单人首蛇（龙）身俑的情况吻合，既显示北齐该类俑与唐代的渊源关系，也说明了人首造型是较早出现的形式。不过从山西长治大历六年（771）王休泰墓出土的双人首蛇（龙）身俑一事得知，在兽首造型出现之后，人首造型仍然持续存在，并未断绝。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581，该节由段鹏琦氏执笔。另秦浩：《南方唐墓的形制与随葬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1期，页76，以及同氏《隋唐考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212。

24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玉琼、蒋英炬）：《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图版貳叁之6-8。

25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韩宝兴）：《辽宁朝阳左才墓》，《文物资料丛刊》6（1982），页108图1。

26 朝阳市博物馆等（田立坤等），同注10，页32图1。

27 安阳市博物馆：《唐杨侃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1982），图版伍之5。

28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云希正）：《天津军粮城发现的唐代墓葬》，《考古》1963年3期，页148；图参见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考古》1962年12期，图版捌之1。

29 王敏之等：《河北献县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5期，图版肆之4。

30 辛明伟等：同注2，页50图13。

31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刘化成）：《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文物》1994年1期，页88图16之4。

32 李振奇等：《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文物》1993年6期，页30图14。

3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韩宝兴）：《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1982），页90图11墓葬平面图所示出土位置图第30号。

人面鱼身俑之最早作品目前见于山西省大同一带北魏墓出土的一件石龕中，系于石平台上后方设一龕，龕左右各立一人，前置方形祭坛状物，左右另立二人像，旁另有一兽面带脊兽及人面鱼身兽，从人像的造型看来，其时代约于五世纪后半叶。此后要到七世纪隋唐时期人面鱼身兽才再度出现，出土频率也明显增高。³⁴ 山西之外，北方唐墓除前述河南杨侃夫妇墓、³⁵ 天津军粮城唐墓、³⁶ 献县唐墓（图 11）、³⁷ 文安县董满墓、³⁸ 南和县东贾郭村唐墓³⁹ 之外，河北定县南关唐墓⁴⁰ 或南和县垂拱四年（688）郭祥墓⁴¹ 亦曾出土同类人面鱼身俑。显而易见的，所谓双首蛇（龙）身俑、人面鱼身俑等并非是山西或沿海地区唐墓的专利，不过其于北方的出土分布，却也只限于山西以东、河南中北部、河北和辽宁朝阳之内的区域，而以晋东南地区最为集中。除了人面鱼身或双首蛇（龙）身俑之外，上述地区出土的其他不知名镇墓兽类彼此造型特征亦有符合之处，如呈伏狮形的陶俑，于山西北石槽三号墓、王义墓（图 12）、河北南和墓、献县墓、定县墓、董满墓、郭祥墓均可见到；⁴² 独角狮形俑既出现于山西金胜村三号墓（图 13）、北石槽三号

34 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现藏大同市博物馆，上置人面鱼身兽之石龕台这一珍贵资料，系承蒙筑波大学八木春生学兄的教示才得知，在此谨致上笔者深挚的谢意。此外，也要感谢成城大学东山健吾教授的恳切解说，才使笔者对于该作品有一初步的理解。从出土地点看来，不禁令人联想到其是否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关？但这还有待日后进一步的资料来解决。五世纪以后人面鱼身一度绝迹，似乎要到北京出土的“大业元年造”铭陶俑才再次出现，报告参见高桂云：《北京出土青釉红陶人首四足鱼身俑》，《文物》1983 年 12 期，页 49。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该带纪年铭文俑是发现于扰土之中，且出土时头部已失，仅存俑身。俑身造型虽与报告书所引著名的南唐李昇陵之人首鱼身俑近似，从而被判断其系人首鱼身俑，不过该俑鱼身造型则与河北唐墓所见人首鱼身俑颇不相同，而更接近于山西天授二年（691）冯廓夫妇墓、长安四年（704）王义墓出土的头似蜥蜴背上带脊的鳞身伏兽，故似有存疑的必要。

35 安阳市博物馆，同注 27，图版伍之 6。

36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云希正），同注 28，图版捌之 1。

37 王敏之等，同注 29，图版肆之 5。

38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刘化成），同注 31，页 88 图 16 之 2。

39 李振奇等，同注 32，页 30 图 13。

40 信立祥：《定县南关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1982），页 112 图 11。

41 辛明伟等：《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 年 6 期，页 24 图 22。

42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沈振中）：《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 年 2 期，图版柒之 7，捌之 4 左；王敏之等，同注 29，图版肆之 7 左；信立祥，同注 40，页 112 图 9；李振奇等，同注 32，页 32 图 19；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刘化成），同注 31，页 89 图 17 之 2；辛明伟等，同注（41），页 24 图 25。此外，类似的陶俑曾见于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 11 期，页 10 图 19）。从近年来的考古资料看来，类似造型的伏狮形陶俑经常见于北周墓葬（报告参见贞志安：《中国北周珍贵文物》，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从其出土位置、件数（一般是一墓两件，个别墓葬则出土四件）及与同墓伴随出土其他陶俑的组合关系，笔者推测其应该和本文所谓的魃头有密切的关联。

墓，亦见于河北献县墓；⁴³ 马首异兽俑亦分别出土于山西北石槽三号墓和河北孙建墓⁴⁴。不过，山西王义、张仁墓出土的兽首人身跪俑（图 14），⁴⁵ 以及王义、冯廓墓（图 15）和金胜村三号墓的头部形似蜥蜴背上带脊的伏兽，目前不见于其他地区唐墓。⁴⁶ 河北定县墓、献县墓、郭祥墓、孙建墓或河南杨侃墓出土的人首鸟身俑则未见于山西唐墓；⁴⁷ 后者人首鸟身俑于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中亦经常可以见到。上述以山西太原、长治地区为主的唐墓出土陶瓷不多，但镇墓陶俑如此齐备，反映了该地区的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认识与西安地区有所不同。此外，就其于墓葬中的陈设位置看来，亦不若所谓天王或魍魉般具有强大厌胜力量。如辽宁朝阳咸亨四年（673）左才墓出土的一对人首蛇（龙）身俑，即整齐地排列于墓室近甬道的魍魉之后；河北垂拱四年（688）郭祥墓从甬道至墓室顺序排列成对的天王俑、魍魉、人首鸟身俑，紧临人首鸟身俑后才陈置人面鱼身俑和匍匐俑各一件。后者匍匐俑早自山东淄博北齐崔博墓已经出现，其既见于前述山西（图 16）、河北、辽宁、河南等省唐墓，也曾出土于陕西省，⁴⁸ 可说是北方唐墓流行的俑类之一。从其造型而言，一般都同意如徐苹芳氏指出⁴⁹ 的可能是《秘葬经》中所记载的仰观或伏听之类的观点。

就目前的出土资料，双首蛇（龙）身俑计分布于山西、山东、辽宁、河北、河南、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等地，其中除了山东淄博个别墓葬出土品可上溯至北齐，山西、河南、辽宁等北方唐墓已如前述有不少属于七世纪初唐时期。

43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边成修）：《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考古》1960 年 1 期，图版陆之 20 左右；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沈振中），同注 42，图版捌之 4 中；王敏之等，同注 29，图版肆之 7 右。

4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沈振中），同注 42，图版捌之 5 中；辛明伟等，同注 2，页 50 图 12。

45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沈振中），同注 42，图版柒之 5；王秀生等：《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 年 8 期，图版拾之 1。此外，长治文明元年（684）乐道仁墓也曾出土一件牛首人身坐俑，亦有可能属同类俑，故笔者过去将该件作品归入十二生肖俑应有修正的必要，见《出土文物所见十二生肖的形态变迁（北朝至五代）》，《故宫学术季刊》3 卷 3 期（1986），页 72 等。

46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沈振中），同注 42，图版柒之 7 左；长治市博物馆（侯良枝等）：《山西长治市唐代冯廓墓》，《文物》1989 年 6 期，页 53 图 1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边成修），同注（43），图版陆之 21。

47 信立祥，同注 40，页 112 图 7、8；王敏之等，同注 29，页 32 图 19 右；辛明伟等，同注（41），页 24 图 19、20；辛明伟等，同注 27，页 50 图 14；安阳市博物馆，同注 27，图版伍之 8。

48 如天宝三年（744）豆卢建墓出土的带冠匍匐俑，参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图 59。

49 徐苹芳，同注 5，页 91。

湖南长沙唐墓之相对年代可从初唐延续至盛唐时期,⁵⁰虽然长沙地区出土有该类俑的墓葬于同省已发掘的墓葬总数所占比例不大,但就可确认的出土作品而言,头部亦有兽首和人首之分,但俑身均呈拱弧形(图17),并且看不出如北方唐墓般人首经常早于兽首的现象,其出现年代亦不晚于北方,是值得留意的事。相对地,四川或沿海地区墓葬的时代则较晚,多属中晚唐时期,⁵¹并持续流行至五代、北宋时期。⁵²目前虽无足够的资料来说明其确切的出现地区,⁵³不过其于北方或长沙唐墓的出现或流行年代显然要早于沿海地区,因此山西唐墓该类镇墓俑不可能受到沿海地区的影响。相反地,后者应有较大可能是受到北方或湖南地区的刺激才开始生产的。相对于山西长治唐墓经常将双首蛇(龙)身俑置于墓室中部;河北、辽宁有的系置于墓室近甬道处所谓魃头的后方;沿海地区墓葬出土位置亦颇不一致,较特殊的如江西彭泽北宋庆历七年(1047)刘宗墓系置于墓室壁所设小龕之中;⁵⁴福建永春五代墓则纳入棺床中的腰坑。⁵⁵

山西唐墓出土的唐三彩

截至目前,正式发表的山西出土的唐三彩共计八处,除了吉县的三彩镗系于

50 如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罗敦静):《湖南长沙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6年6期,图版拾伍之1;何介钧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12期,图版捌之3;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黄土岭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3期,图版陆之2。

51 如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林宗鸿):《福建漳浦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11期,页609图2之7、8;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发现唐墓》,《文物资料丛刊》6(1982),页123,后者为木制俑。

52 出土实例甚多,除了徐苹芳(同注〔5〕)所引用的江西彭泽宋墓(《考古》1962年10期),南京李昇陵(《南唐二陵发掘报告》,1957)之外,五代墓如:扬州市博物馆(张亚生等):《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8期,页46图16、17;页50图22等。另外,宋墓发掘报告可参见以下数例:彭适凡等:《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5期,页32图9;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任锡光),同注13,图版伍之6;曾凡:《福建连江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5期,图版捌之8;程霁红:《安徽望江发现一座北宋墓》,《考古》1993年2期,图版柒之4;苏州博物馆等(钱公麟等):《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12期,页33图19等。

53 徐殿魁氏曾经指出,墓龙、仪鱼、人首鸟流行范围先在长城内外,尔后又传及大江南北(徐:《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学报》1989年3期,页280)。此略有武断之嫌,如同氏所称的墓龙(双首蛇〔龙〕身俑)于湖南长沙的出现时代亦颇早,而所谓的人首鸟不仅常见于长江中游墓葬,其年代亦不晚于北方,如安徽合肥隋开皇六年(586)伏波将军墓,即出土一对分别呈男面和女面的人面鸟身陶俑。报告参见安徽省展览、博物馆(胡悦谦):《合肥西郊隋墓》,《考古》1976年2期,图版壹之3、4。不过,从前述山西大同市博物馆藏五世纪石龕台上见有人面鱼身兽等情形看来,人面鱼身或所谓“墓龙”极有可能源自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其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南北并行的两个地带,而山西省正位置于此二地带的通道之上。

54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陈柏泉):《江西彭泽宋墓》,《考古》1962年10期,页539。

55 晋江地区文管会等(刘汉瑶等):《福建永春发现五代墓葬》,《文物》1980年8期,页52。

断壁下发现，长治市东郊南北石槽、壶口、宋家庄等出土的钵、镗等系征集回收品之外，其余均出土于墓葬，分布于太原和长治两地区。此外，依据学者们的亲自见闻或相关图录的间接引述，则中国国家博物馆亦收藏有长治出土的唐三彩；⁵⁶ 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太原董茹庄出土的三彩罐。⁵⁷ 其次，榆次、运城、临汾等地亦曾出土。⁵⁸ 从太原董茹庄出土的双系罐罐身分别施罩绿、蓝、褐、白等多种彩釉得知，山西出土唐三彩中也包括以钴蓝为呈色剂的作品。

经报道出土唐三彩的六座墓葬当中；包括两座纪年墓。其中长治西郊景云三年（710）李度夫妇墓只见一抱雁女俑（图18），造型特征与过去扬州唐城遗址所出三彩作品相似，⁵⁹ 可提供判别后者相对年代的重要线索。另一座纪年墓位于长治市北郊漳泽电厂工地，该墓所出陶俑和明器种类虽较丰富，但三彩作品只有一件小盖钵（图19）。从伴随的墓志得知，墓主崔擎卒于乾封二年（667），与夫人申氏合葬于永昌元年（689）。报告者王进先认为伴随出土的三彩是崔擎卒时的早期唐三彩，不过从该墓出土陶瓷组合特点及带颈罐、高足灯等器形多与同省推测属七世纪末期墓葬所出作品相近，笔者初步判断墓葬所出作品应系永昌元年合葬时埋入。⁶⁰

另一方面，经报道出土有唐三彩的非纪年墓均位于金胜村且皆绘壁画，从壁画作风或唐三彩的存在时代虽可推知其大致的相对时代，但仍缺乏足以进行详细编年的伴随文物。如1988年发掘的三三七号墓，报告书中仅刊载壁画图版和开元通宝铜钱拓本，其余文物图片付之阙如。报告者依据壁画作风和开元通宝钱铜具唐代前期特征，推断该墓时代当为唐高宗时期（650～683）。壁画的构图布局，或画面上的人物服饰、建筑样式等虽是判别其相对年代的重要依据，不过要将山西地区七世纪中末期与八世纪初期的壁画予以截然划分，在目前仍然相当困难。而若就学者对于开元通宝铜钱的分期研究，则同墓伴出的铜钱钱文与唐代前

56 小山富士夫，《正倉院三彩と唐三彩》，《正倉院の陶器》收（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71），页113。

57 李知宴：《唐三彩》，《中国陶瓷全集》7（京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1983），图126。

58 柴泽俊编：《山西琉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页5；另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山西出土文物》（1980），图170。

59 《南京博物院展》（名古屋：名古屋市博物馆等，1981），图84。

60 应该说明的是，李知宴氏曾经提及长治漳泽电厂三号唐乾封二年（667）墓曾出土一件三彩小水盂（李：《中国釉陶艺术》，香港：轻工业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页124）。若属实，则该件作品应是目前年代最早的一件纪年三彩器。不过从该墓的所在位置、作品种类以及墓志纪年等推测，漳泽电厂三号墓有可能即崔擎夫妇墓，李氏以崔擎卒年作为纪年依据，本文则以合葬的时间为墓葬纪年。